清华美文90年

丹　妤　选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清华校友创作的散文、诗歌的选集,共收入 90 位作者的近百篇作品。其中不仅有二三十年代执教清华的学者的散文或词作,还选录了西南联大时期教授的诗、文精品,也包括八九十年代清华学生的校园文学创作。

本书可供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

书　名: 清华九十年美文选
作　者: 丹　妤　选编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 www .tup .tsinghua .edu .cn
印刷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 32　印张: 10 .5　字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4373-6/ I・32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0 .00 元

端木蕻良

作家。原名曹京平。1912 年生,辽宁昌图人。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先后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重庆复旦大学、长沙水陆洲音专等校,曾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等职。1996 年辞世。著作如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新都花絮》、《曹雪芹》,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江南风景》,京剧《红拂传》、《戚继光斩子》,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记一二·九

在一二·九的当儿,我早已离开清华大学了。那时我已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快一年了,不能出版。(我那时左腿正闹着轻微的 Athorthesis,一直到送鲁迅先生的殡都还未好)没有写什么,也没想什么,只盼腿快好,我可以到南方来。我住在我母亲处那个宅子,是个古老的府第,我住在东跨院,和主宅完全隔离,在过去应该是属于一位待字的小姐的起卧处。我每天除了“烤电”以外,便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看见叶子繁密了,变黄了,脱落了,一直坐到深夜很晚很晚才睡。

朋友自西郊来,说施乐建议,或者抬一口棺材到街里游行,棺材里装满传单,在游行时散放出来!或者……后来北平学生并没有采取那种可悲的示威办法,而雄壮的在街头出现了。第一次的游行,固然像胡适之博士所说,人不算多,秩序还很整齐,言外之意

就是游行一次也好,没有什么,算了吧!当时主其事者也没有想到会动员到两千至三千人之多,从这获取了更大的信心。于是就发动了第二次的扩大行动。第一次是猝不及防的,军警都已失去约束能力。而这次(十二月十六日)在布置上便相当艰苦了,必须守绝对秘密,使他们无从知晓所以决定的日期集合方法,都是秘密的。

我参加的是燕京大学的队伍。先一天晚上我便到校里去住了。母亲问我几时回来,我说:"不回来了!"母亲笑一下,没说什么,只说:"烤电不要耽误了,你出门坐车,不要步行!"

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说——

"当心身畔有没有陌生的人,免得奸细混进来!"大家互相回看着,严肃而又有趣的猜疑一下,一个真正的同学被三个热心家包围住了,一直盘问到他拿出借书证来为止。我安详的坐在那里,没有人疑惑我,也没人以为我面孔陌生。

"我们现在开会连灯光都不敢开亮,怕被外面监视我们的军警看见亮光扑进来!同学们,我们此时的感情是悲愤的,我们惟有用行动来克服这种耻辱。我们决定再来一次扩大游行,明天六时集合,出发!"

那天夜里,已有一部先遣部队派到城里去,因为上次燕京、清华两校都被关在西直门外,结果城里看不见两校的旗帜。有一位同学临行时,大哭一通,说决定不回来了(后来他果然被捉了去)。总之,这次出发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家都晓得一定开枪,段祺瑞的血手又要在宋哲元的胳膊上运用一次了。

第二天早起有女同学到各楼房去催唤,大家在一楼前面集合。有的带了"围巾"出来,连忙又送回去。因为上次有许多位同学,被追在后面的警察扯住围巾捉去了。每人发一个布条作标帜,每人在册子上签了名字。

不知怎样我成了第二队队长,我想我并非本校同学,不大好,

便作了个小队长。不过那位第二队队长很沉默,动作也很迟缓,所以后来第二队的事,都是由我来号召的。攻入西直门之后,我一直没见着他。大队共分三队,第一队队长是个女的,号召能力很坚强。出校门时四个人挽起,向前冲,军警用扇面形式包围我们,一则他们人少,二则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进不去城,所以也没十分阻挡。一个面部带点稍稍困惑的表情的女同学,当时晕倒了。有两位女同学,跑过来,踌躇了一下,便决定留下来看护她。沿途居民都还没醒来,有的披衣起来观望,同学把传单散给他们。到了西直门,门关得紧紧的。有人想爬城,爬是可以爬上去的,但不能大家都进去。留下来讨论,一面对警察散传单,讲演。清华同学也来了,这时已有一千四百人的光景,于是大家决定到阜成门,因为据说××学校三百人已经爬城进去了。到了阜成门也不成。于是转到西便门,这时我们已走了三十里路了。西便门上边的守兵,便向下边丢石子,砖头,瓦块。大家喊:“欢迎抗日的廿九军参加我们的队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果然就不打了。西便门上有铁片包着,中间是一个大铁闩,用铁锁锁牢,下边立一个二尺高的石挡石。大家便来推门。

推不开,有几个同学力气也使光了。我想,这样不大好,便让大家分拨来推,一批四十人喊:“一、二、三、四!推!”一、二、三,都是一小推,到‘四’算是一大推。这些人力尽声嘶了,再由另外一批来接着推!里边不晓得有带刀的兵没有。大家只想推最前一排,有几个人向我身上推,我是在两扇门的夹缝那里,眼睛看见那铁闩在屹然不动,不过嘴上却喊,“就要开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人的力量越来越猛,身子便被一推一迭撞在门板上。有人喊我,他们认出了是我。是从前的同学,有一个眼里充满了泪,喘着气,对我说:“前边这排都是东北人,我们都加入冲锋队来的!我……”后边的力量把我们重新掷在门上。他是清华的。门的波动加大了,“就要开了,铁闩快断了!”忽然嘎地一声,铁闩就断了,于是关门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蜂拥过去。把队伍整理一下,向彰仪门进发。这时口号就喊得更响了。宋哲元此时已接到报告,不晓得那时他脉搏的次数跳得如何。以前清华的同学到喜峰口去。给他们修公路,抬伤兵,慰劳。现在是面对面的站在两个极端了。

在彰仪门大街那里,前边有大队警察堵截我们,街上满是打折了的棍棒,石块,砖头,密如星罗。显然先前已经混战过了。这次他们带了更多的皮鞭,铁锹(举起打头部),大刀,棍棒,竹竿子,枪把子,水龙,赶来了。同学们如在对付一群疯狗,或是逸笼的野兽,没有一个人向后跑,一声冲,大家冲上前去了。他们便把棍棒竹竿皮鞭齐下,大家就在地上拾起砖头回掷他们。有两个不相识的女同学苍白着脸,把手挽在我的胳膀上,我便丢了手中的石块,拉着她们向前跑。冲过三道防线,警察完全失了效用,有一个警察被大家打在地上,一个同学拿起石块便向他头上砍。我说:“不要打死他,让他去吧!”同学便把他的帽子抓起来,丢在一家砖墙里去,用脚在他身上乱踢。到了师大附中,同学们因为被软禁在里面不能出来,便从铁门里拿棍棒给我们,我们如虎添翼。前边有一队警察一露头,我们喊一声:“追!”他们便跑走了。有一个从前和我同班的女同学,头戴着小红帽子也跑来跑去,脚下的半高跟鞋很妨碍了她。这时听说北大的同学在城里被打伤的很多,他们把水管夺过来,对警察身上射。中学的小女同学尤其奋勇,亲手夺水龙。

大队到了前门我们已经会合了辅仁、平大、北大一部……各校都全了。城门已闭,在东交民巷那边有半边开着,半个门洞里提枪的很多。先是双方商议着和平的进城去。只一刻钟,和平便绝望了。他们大队开来堵住那里。里边还有军队在演操示威。

一位大个子队长,出面交涉。这时外国记者云集了来拍照。大家不散去,要求和里面的取得联络。那位队长,非常老练,态度很沉着。忽然站在“派出所”石阶上的保安队,两三个壮汉,好像午觉刚睡醒,上身只穿白小褂,脖领也没结,拿出枪来,“你们退不

退！”没有人理他。只有一个燕京同学，质问他为什么不穿军服，“你看你那像军人样吗？脖领也不结上？”你们退不退？不退开枪了！”燕京的队伍站在最前面，第一枪便开了。大家很有秩序的向后一退，并没逃。四边铺子便连忙关门，有的人向里边跑，有的开了门放进去，有的便拒纳。我蹲在一个二尺半高的四寸宽的水门汀的石柱那儿向前看，听见枪不响了，大家又集合起来，有人说谁受伤了，谁不见了，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这之前，大家召开市民大会，决定八个议决案，反对领土分割，政治分割。由一个穿青衣服的同学主席，他态度很从容，处理得有条不紊，声音很清楚。当时的《北平时报》的记载，我还保有，可惜不在手边，我希望炮火不会寻找到他。

这时那穿披风的保安大队长便说，为避免摩擦起见，顶好在宣武门进城。于是大队便向宣武门移动。这是个骗局。前边燕京清华走到西河沿，便发觉后方被他们切断，于是便掉转头来重新衔接一起。而到达宣武门时，门里北大的同学的喊声我们都可以听见。只是比前门还难得打入，这时骗局才完全被证实。听见城内悲壮的声音，心灵仿佛受了一种磁石的吸引，两颗硕大无朋的心脏在凶狂的鼓动的时候，中间只隔一道铁板——宣武门！何况门上还有同学向下面报告：“只要你们进来，就成了！”他把我们同学打伤了六七十，捉去了三十！”你们必得把城门打开！”于是便有清华的那位女英雄，爬过城门去，从城门下爬过去的，到里边好把门栓拉开，那天她穿一个皮短衣，工人裤，像个不大健康的男孩子似的爬了过去。那边正好有警察等待着她，捉住了她。

天渐渐黑下来了，有人去吃一点东西，喝一点茶。因为从早起出来，连一滴水也未入口，我的腿明天必须‘烤电’了。有一位东北同学，个子不大，急躁的跳过来，对每个吃东西的人，大闹起来，“你们还想吃东西，喝茶，你们还有心肠吗！”有的便不吃了，退回队伍来。我觉得那杯茶并不妨碍我们的示威，我仍坐下来喝完它。他

便对我咆哮起来。我说:“你喝口茶再来嚷,你声音可以提高些!”他一气跑走了。

这位唐·吉诃德的悲愤是完全失败了。有许多救亡团体或慈善团体或者同情中国的外国朋友都送面包来了,也有人去吃面去了。不过还有人不想吃,我因为肚子被悲愤装满,也没吃。

天已黑下来,清华、燕京同学决定回校去。但是有一部分过于热情的同学,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同学,他们不走,一定等到非把宣武门冲破了不可。他们决定露宿在那里。有些女同学,临时在前门外开旅馆去住。街上便黑压压坐了满街人,他们准备在这里度过这漫漫长夜。

在十时左右,在夜的寒风里有计划的军警便伺伏在四边了,他们把铁栅栏拉住,先断绝逃走的路。于是将街灯熄灭,木棍、大刀、皮带从各方面纷逼而来。有人逃到角落里蹲伏了,皮带大刀赶着打,有人失去了鼻子,皮带大刀赶着打。在夜里二时,附近的居民还听见惨烈的呼声!宋哲元想将人类的憎恨种到痉挛的血肉里去,这一点他是成功了,他将憎恨和认识栽种在青年的心中。……

从此便继续着游击战术和乡镇宣传,将燎原的火种推广到乡区里去,交给它真正的主人。

一二·九运动是反对中国领土分割的运动,是号召全民族对日抗战的很好的开端。一二·九的行动者比五·四时代要更富于政治性和行动性。将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联起来,再来认识由芦沟桥到八·一三的抗战,则这一运动在中华民族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上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没有烤完电便蹩着脚到南方来了,那不是我母亲所希望的,但她也并不愿我静待什么可耻的黑手的擒拿!

(原载《七月》第 2 期,1937 年 11 月 1 日)

韦君宜

作家、编辑家。原名魏蓁一。1917 年生,北京人。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中国青年》总编,《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社长等职。著有散文集《故国情》、《似水流年》,小说集《女人集》,长篇小说《母与子》等。

二·二九那一天

二·二九那一天,是清华期末考试的日子。——本来,期末考试不在这时候,因为上学期末又示威游行,又下乡宣传,又罢课,实在考不成了,才在这时候补考。

补考归补考,我一点儿也没有开夜车念书的劲,还是睡我的大觉。那一阵,我屋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同屋,我一个人住了一段。屋内挺安静,我睡得正香。

忽然间,我的肩膀被人狠狠推了两下,我醒了。揉眼一看,在还不很亮的屋子里,站在床前的是静斋女工友白妈,她急急忙忙断断续续只说了两句短语:"魏……魏小姐!您还不快起来?了不得啦!"她并没解释是什么事情了不得,但是我却立即豁然贯通,急忙把棉袍伸上袖,脚蹬上鞋,来不及穿袜子扣钮扣就往外跑,只见人们已有不少都从屋里出来,挤到了走廊上,一个个惊惶失色地互相告诉着:"都围上啦!四面都围上啦!"

迎面碰见彭克谨(彭克),她那时候还没加入民先,是同情分子。她看见我,一把拉住,就拉到她自己屋里。她是和孔祥瑛同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孔祥瑛是我们的女生流通图书馆馆长,但并不怎么“红”。这时正在屋里张罗。屋角坐着陆璀,正在低头写准备自己被捕以后留给母亲的信。还有一位避难者是谁我忘了。屋里还拥着好几位同学,她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几个是逮捕的目标,都来关心地想办法,有人替我们回屋找毛裤和袜子去了。我隔着玻璃望窗外,只见曙光中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穿皮革短大衣的警察,把楼围得紧紧的,一个个指手画脚,还有许多漆黑的军用摩托摆在楼前,黑森森一片寒光。

他们为什么不上楼抓人呢?有同学进来报告消息,原来女生指导员蒋思钿先生已经出面,来了个缓兵之计。她对他们说,静斋女生宿舍的规矩是不准男人上楼。要捕人,请他们另叫女警察来捕。所以人都在楼下围着。这时彭克和祥瑛就出主意:“你们得弄个假名字,想脱身之计。”说罢便找出学生名册来,翻那些现在不在校的女生名字。结果找出好几个华侨学生,放寒假走了还没回来。

“行了!就顶他们的名字。我们作证。”于是胡乱指派一番,我算顶菲律宾华侨黄晚好的名字。大家还一起编了几句口供。安排已毕,衣服也穿好了,倒没有事了,就扒在窗户前看事情发展。

只见先是蒋南翔双手被绑着,由两个警察两边抓着他过去了。我心里一个冷战,这次逮捕非同小可,怎么首先就能抓住老蒋?这恐怕非有特务内线办不到。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共青团不久,老蒋正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心里急,却不能说出,仍旧注目看窗外。

一会儿又照样绑过来一个,却是纠察队长方左英。站在我背后的同学诚静容,忽然惊叫一声:“方左英,这真是纯洁的爱国青年哪!怎么连他也抓?”是呀!连他也抓,说明不分左派非左派,凡参加救亡运动的都抓!我知道自己这次跑不了,什么也不想,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忽然,从静斋东面嗵隆隆跑过来一大片男同学,我们在屋里坐以待捉的人身不由己都跑到楼口。只听楼外男同学们大喊一声:

“女同学冲出来啊!”我们全楼女同学就好像山洪暴发,所有的人哇哇地喊着,一拥奔下楼梯,每个人奋勇争先,有的人一跳两三阶,我记得自己简直是跌下楼去的。楼口虽有些黑衣武装警察把守,哪里挡得住这一股由姑娘们构成的奔腾咆哮的洪流。我们全体冲出了警察的包围,和男同学汇合到一起,直奔西校门。在西校门,大家冲进校卫队室,抢回了被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个人。我记得后来又到南大门,一些男同学手拿长柄痰盂盖、军训枪、大笤帚往前上,把那些军警打出校门去。他们被打出之后,还想再往回攻,我们就不分男女大家一起往前推挤着校门,不让他们进来。我在人群里拼命地推着挤着,忽一回头看见我身边正挤着姚胖子(姚依林),他向我笑笑,只说了一句:“呵呵!好啊!”倒像刚才被捕的不是他自己。

打完了这一仗,开全体大会,议决死守。还加强了防御和巡逻,纠察队登梯子上墙瞭望。发现敌情,立即报告。

这一天别说考试,连饭也吃不下,大家议论的无非都是军警还来不来的问题。警车全被我们砸烂了,他们能不来吗?

果然到晚上就报警了,只听嗥嗥嗥震耳惊心的钟声,又召集全体同学集合了。这次集合,到的人数特别多,在静斋门前人影憧憧人声杂沓中,只听得叫唤的声音:“大家上体育馆去!”于是大队向体育馆方向移动。我的共青团关系并不在学校,刚入团就把我派到城里妇救会去工作了。在这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有同学们。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上体育馆。陆璀在我旁边。她在说:“在群众里是最安全的啰!”

一边走一边还有人陆续加入,只见孔祥瑛在队伍里大声向人说着:“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咱们清华人还能再不……呀?”是说不能再分左右?不能再分你我?抑或不能不团结?不能不和军警打?今已失记,疑莫能明。但是这个一向文静极了的姑娘忽然如此奋起的神情,我是总记得的。

刚走过小溪上的小红桥,她忽然又一把将我拉出队伍,悄悄对我说:“你别跟着走啦!另找地方躲着去。”

我不知道她的话自何而来,但当即听从,出了队伍,站在旁边。马上,阿平(韦毓梅)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拉着我说:“走!”

我跟着她就走,还有王作民。走进林间小路,她才告诉我,去西南院朱自清先生家躲着去,朱先生是她的系主任,会收容的。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学生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儿又有人按门铃,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有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都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停一会儿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这时朱先生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一听,便在电话里吩咐:“来搜查,让他们搜查吧!不必抵抗。几个图书馆员哪里抵抗得了武装士兵!”放下电话,他告诉我们:是图书馆打来的。已经搜到图书馆了(那时他兼任图书馆馆长)。然后在屋里转了两个圈,忽然愤愤地面对我们,说:“堂堂国立大学,又没有亡国,竟有这么好几千军警带着机关枪跳墙进来搜查抓人,把大学管理规章当成粪土,把大学学生看成了强盗,真是从古以来没听说过的事!”他显然极为激动,但是没有拍桌子骂人,语调庄严。这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深沉的愤怒,跟当时只知道冲锋的我们不一样。

清晨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

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哩，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望，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 12 期，1985 年 12 月）

黄秋耘

散文家、评论家。原名黄超显，曾用名黄秋云。原籍广东顺德，1918 年生于香港。1935 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国际笔会中心会长。著作如散文集《浮沉》、《丁香花下》、《锈损了灵魂的悲剧》、《黄秋耘散文选》，评论集《苔花集》、《古今集》、《琐谈与断想》、《黄秋耘文学评论选》，回忆录《风雨年华》等。

丁香花下

——清华杂忆之一

从 1935 年初秋到 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我在清华大学度过了两年的峥嵘岁月。在这两年当中，我经历过一些严峻的考验，甚至执行过一些相当危险的任务……可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时常涌现在我的回忆中使我永志难忘的却是一桩寻常的小事和那位跟我只有“两面之缘”的“救命恩人”。

和我同时代的同学也许还会记得，1936 年 3 月 31 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北口，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片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四个同学，打伤了上百个同学

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游泳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叉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模样儿有点像《城南旧事》中那个林英子,年纪却比林英子大好几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她拦住我:"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又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我粗手粗脚的,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过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哥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凑合,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个人呀,真是个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了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

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在清华的小医院里缝合好伤口,休息了三五天,就痊愈了。我总想着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约她在下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边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在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对方的尊姓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红着脸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甭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哥哥交代!”

“不要紧。他也不是经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在中国大学上学。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给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呢?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呢?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似乎想问我的姓名,但是欲说还休,很快又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我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紫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要说是“爱情”吧,恐怕算不上,要说是友谊呢,又和普通的、寻常的友谊不太一样,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革命的情谊,一种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革命情谊,而且产生在两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女之间,这是人世间最值珍贵的东西。不知怎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甚至不知道我这位“救命恩人”是否还在人间,但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香花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仿佛又听到她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 11 期,1985 年 4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